

第一章

接管前夜

1948年3月23日，對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來說，是一個有著特殊意義的日子。這天一大早，數十名船夫就在川口渡口（離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最近的渡口）集合，準備把毛澤東及其工作人員擺渡過黃河。¹一年前，國民黨的胡宗南將軍對延安發動一場大規模的進攻。共產黨軍隊居於絕對劣勢，被迫放棄延安。那時，整個中共革命似乎希望渺茫。撤離延安後，毛澤東化名李得勝，重拾游擊戰術，轉戰於一個又一個村莊。面臨險惡環境，毛堅決拒絕東渡黃河暫避。他相信，繼續留在延安附近的陝北地區，可以給共產黨軍隊及其支持者鼓氣加油。

不久，戰爭勢頭發生逆轉。1947年8月，共產黨在沙家店戰役中發起第一次反擊，消滅胡宗南部兩個旅。七個月後，在宜川戰役中，共產黨軍隊殲滅胡的主力部隊——第26軍共計28,000人，完全打垮胡宗南。這個戰役，標誌著西北戰場上的主動權開始轉向共產黨一方。正如毛澤東所言，此時渡過黃河，將成為共產革命發展到全國的一個重要步驟，具有象徵意義。戰爭也將不再在共產黨佔領區域，而是在國統區展開。

多年以後，警衛員依然記得毛澤東渡過黃河前，對陝北革命根據地道別的情形。²早春時節，黃河上相當寒冷。渾濁的黃水夾雜著巨大的冰塊，雷鳴般地拍打著堤岸。受到黃河偉力的感染，毛澤東一邊凝視著急流和漩渦，一邊對隨行人員講：「你們可以藐視一切，但是不能藐視

黃河。藐視黃河，就是藐視我們這個民族。」³毛澤東崇拜黃河。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和知識分子共有的情感。

中國有句古老的格言：「載舟之水亦覆舟」。這反映一種傳統信念，即老百姓像河水一樣，既能鞏固一個政權，也能推翻一個政權。此時，在與蔣介石的戰爭中，革命根據地正在日益強大。對於來自老解放區的支持，毛澤東充滿信心。⁴在毛澤東及中共看來，真正構成挑戰的，還是共產黨能否獲得新解放區，尤其是城市的支持。因此，對近期的軍事勝利表示激動之餘，毛並沒有忘記告誡黨員們：「我們如果在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是不能取得勝利。」⁵

制定城市政策

共產黨的城市政策與農村政策是緊密相聯的。橫渡黃河數天前，毛澤東收到劉少奇的一封電報。劉原任北方局書記，當時是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工委書記。該電彙報說，中共中央工委在河北省召開一次會議，旨在糾正華北和華東地區「左」的偏向。劉少奇指出，在山西和山東的土地改革中，殺人太多。中央工委已經認識到這樣做損失很大，並必須加以約束。⁶毛覆電指出：「此次工委和華北、華東、華中各負責同志一起，徹底檢討各項領導工作上的錯誤缺點，並由此獲得糾正，〔黨的工作〕走上正軌，極為欣慰（方括號中為引者所加）。」⁷

在路過已經解放的晉綏邊區時，毛澤東發現，地方政府非但沒有把地主掃地出門，反而公平對待地主、富農。在那裏的土地改革中，地主、富農分得與貧農相等的土地。毛對這種穩健的措施稱讚有加。他告訴晉察冀中央局書記、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斯大林毀滅富農的政策嚴重損害蘇聯經濟，中國必須吸取俄國人的教訓。⁸

毛澤東接連起草致鄧小平電和一份黨內指示，表達同樣的擔心。在給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書記鄧小平的電報中，毛批駁那種廣大貧農擁護過激政策的論調，指出中共孤立和打擊的對象僅限於「政治上站在國民

黨方面」堅決反共的分子。對這種策略的好處，他還解釋說：在財政政策上實行合理負擔，會使地主和富農多出錢，軍需負擔大多落到他們身上。現在這些地區，中共如不發動土改，而是繼續開展「減租減息」，那麼農民將會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共產黨也將贏得更多的支持。⁹這份黨內指示進一步強調，不應當把新區「列入1948年進行土地改革的範圍」。毛指出，中共「應當充分利用抗日時期的經驗」，以便聯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聯合或中立的社會力量，完成消滅國民黨反動勢力的基本任務。¹⁰

「左」傾既來自於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對農村局勢的判斷，也源於他們渴望動員更多的農民，加快農村革命。¹¹然而，1948年時，毛澤東更感興趣的是穩定新解放區形勢，而非發動徹底的社會改革。從關於土改政策的電報可以看出，毛澤東的城市策略與農村政策是一致的。他非常擔心，對地主、富農暴力相向，排斥中農，會嚇壞城市的資產階級；農村革命者可能會把「左」傾作風帶入到城市工作中；不首先穩定農村新解放區，中共就不可能在城市站穩腳跟。

早在1948年2月，毛就建議，在新解放區，尤其是城市中，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應該是「發展生產，繁榮經濟，公私兼顧，勞資兩利」。¹²顯然，發展城市經濟需要各社會團體的合作。中共必須小心謹慎，放緩農村地區的過激行動。在1948年，中共領導層就此很快達成共識。¹³

渡過黃河後，毛澤東等人來到山西省繁峙縣。在一個名叫伯強的小村子裏，毛得知，經過激戰，人民解放軍再度攻克洛陽城。¹⁴這一次，毛和他的戰友們確信，中共完全有能力佔領並統治這座城市。1948年4月8日，毛給洛陽前綫指揮部起草一封電報，向中共領導人說明城市政策應特別注意的各基本要點：

1. 極謹慎地清理國民黨統治機構。
2. 對於官僚資本要有明確界限，不要將所有國民黨人經營的工商業都加以沒收。

3. 禁止農民團體進城捉拿和鬥爭地主。
4. 入城之初，不要輕易提出增加工資、減少工時的口號。
5. 不要忙於組織城市人民進行民主改革和生活改善的鬥爭。
6. 大城市必須有計劃地處理糧食和燃料問題。
7. 國民黨員和三青團員，必須予以清理和登記。
8. 嚴禁破壞任何公私生產資料和浪費生活資料。

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在城市要想成功，關鍵在於選派能夠執行黨的政策的人選。因而，在這封電報中，他指示軍隊指揮員：「市委書記和市長、副市長必須委派懂政策有能力的人擔任」。¹⁵

毛澤東給洛陽前綫指揮部的這封電報，第一次詳盡地闡述共產黨的城市政策與城市紀律。歷史證明，毛的城市策略非常及時。薄一波，時任華北局第二書記，50年後曾回顧1947-1948年間中共在接管華北城市時的混亂與破壞情形。他指出，在毛澤東闡明中共的城市政策與策略之前，來自農村的共產黨人「走過一些彎路」。薄指出，1947年11月人民解放軍一攻克石家莊，士兵們就開始搶奪公私財物，新的共產黨管理者還鼓勵城市貧民這樣做。除了這些城市浩劫，四鄉農民也湧進城市，參加搶劫，分享「勝利的果實」。最終，城市不得不實行戒嚴，恢復秩序，「甚至槍決了幾個人」。薄一波回憶說，人民解放軍佔領邯鄲、焦作、運城等華北幾個城市後，中共新管理者重犯過同樣的錯誤。¹⁶

1948年4月19日，薄一波把這些情況向毛澤東做彙報。針對有些農村革命者認為「不鬥工商業，不能……滿足群眾要求」的論調，毛澤東在薄的報告上批注道：「這類思想是一種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其性質是反動的，落後的，倒退的，必須堅決反對」。¹⁷毛還數次強調保持穩健的城市政策的重要性，並把共產黨接管城市的指導方針概括為兩句短語：「原封原樣」、「原封不動」。¹⁸

儘管如此，毛澤東關於土地改革和城市工作的穩健政策，看起來仍顯得有些模稜兩可。他總是強調，共產黨革命的終極目的是將整個社會

打個天翻地覆。按照這種分析，地主、富農最終要被消滅；接下來，革命的目標將對準城市資產階級。不過，毛澤東像一名耐心的獵手，總能控制住自己的隊伍，等待最佳時機，利用最優手段，消滅敵手。從這一視角出發就能理解，為什麼毛在不同場合的講話似乎令人困惑或自相矛盾。一方面，毛鼓勵地方黨組織立即開展社會改革，以滿足革命群眾的需求；另一方面，在那些廣大群眾還沒有覺悟、黨還沒有樹立威信的地區，他又要求黨和政府保持耐心。

留給地方幹部的難題在於，如何判斷進一步實行社會改革的時機是否成熟。各級幹部往往誇耀他們動員群眾和發展黨組織的成績，急於發動和加快過激的社會改革。這樣做，可以證明自己忠誠革命，追求進步。地方幹部的狂熱與中央政策的模糊，正是中共領導層不斷向「左」傾做鬥爭但始終未能克服的主要原因。

決戰前夜，毛澤東發現，黨內出現分散主義傾向。隨著接管的農村和城市越來越多，中共軍隊被劃分為野戰部隊、地方部隊與游擊部隊。一些無紀律、無組織狀態以及地方主義、游擊主義隨之產生。毛對某些中共幹部尖銳批評道：「必須堅決克服許多地方存在著的某些無紀律狀態或無政府狀態，即擅自修改中央的或上級黨委的政策和策略，執行他們自以為是的違背統一意志和統一紀律的極端有害的政策和策略」。¹⁹ 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臨時所在地西柏坡村，毛召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該會議通過諸多決議，其中之一就是大批訓練幹部。²⁰

準備幹部

1948年9月會議之前，中共對國民黨防守薄弱的側翼——山東省省會濟南發起進攻。山東的戰爭進程表明，蔣介石將提早覆亡。中共中央預計，從1946年7月算起，從根本上打敗國民黨約要五年時間。²¹ 在農村根據地時，毛澤東對中共黨員一再說明：革命的最終目的是奪取城市。²² 此時，軍事形勢顯示出，中共已經接近佔領全中國，並將很快

回到自1927年春天被逐出的城市。²³在這種形勢下，怎樣招收和培訓新幹部，跟隨共產黨軍隊接管新解放城市呢？9月會議特地解釋說：

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要求我黨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幹部。戰爭的第三年內，必須準備好三萬至四萬下級、中級和高級幹部，以便第四年內軍隊前進的時候，這些幹部能夠隨軍前進，能夠有秩序地管理大約五千萬至一萬萬人口的新開闢的解放區。²⁴

然而，對於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中共怎樣準備如此大量的幹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並沒有予以解釋。來自何方的幹部去接管杭州，也無從知曉。

共產黨部隊正打算在各個戰場展開大規模進攻，幹部供應嚴重不足。由此，抱怨成為家常便飯。在給第二野戰軍和第三野戰軍的電報中，毛澤東建議把軍隊轉變為工作隊，「佔領八九個省、佔領幾十個大城市所需要的工作幹部，數量極大，這主要依靠軍隊本身自己解決。」他要求二野和三野暫停一切工作，在「一個整月內，全部學習城市工作和新區工作」，「軍隊幹部應當全體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²⁵後來，在接管杭州時，軍隊的確厥功至偉。然而，繼續追殲國民黨殘餘力量、解放其他省份仍是軍隊的首要任務，留在城市的軍隊幹部僅佔少數。

毛澤東也嘗試著「從國民黨統治的大城市中去吸收」幹部。他指出，在這些城市中，許多工人和知識分子「文化水準一般要高些」，中共絕不能忽略這些幹部資源。²⁶江南地區是國民黨的老巢，中共影響有限。在佔領滬杭之前，中共也不大可能在這些地區招收幹部。況且許多地下黨組織已經遭到國民黨的破壞，少數幸存者在艱險的條件下，難以發揮重大作用。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根據石家莊市的經驗總結說：秘密黨員中「有很多是極不純潔的……完全不能倚靠他們來管理城市」。²⁷

共產黨領導人陳雲曾負責接管瀋陽和東北其他工業城市。他向中央遞交一份報告，表示贊成毛澤東的想法，並建議人民解放軍和老解放區

應為共產黨接管新城市準備幹部。他說：「除方法對頭外，需要有充分準備和各方面能稱職的幹部。依目前形勢看，中央和各戰略區野戰軍，均需準備有專門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其中骨幹可以暫成專職，依次接收各大城市。」²⁸陳雲的基本觀點是，軍隊和地方黨組織不能一佔領一座城市，就向中央伸手要幹部；而應自己訓練幹部，並支援其他新解放區。東北的戰爭接近尾聲時，中共中央要求陳雲組織兩套幹部班子，一套留在東北的城市工作，另一套跟隨人民解放軍向南方進軍。實際上，從東北調出的幹部數量有限，也沒有去東南地區。

1948年5月，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電華北局，要求其立即辦理「大黨校」、「大軍校」，以及一所為城市工作培訓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的大學。²⁹同年12月，中共中央計劃「從濟南、濰縣及徐州職員工人中抽調大批比較進步的人員進行短期政治訓練」，準備接收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³⁰1949年1月29日，華北局頒發一份文件，名為《華北目前形勢與一九四九年的任務》。其中第五部分指出：「根據全國革命形勢和革命任務的需要，加強幹部學校（華大、軍大、華幹、職幹等）等的工作，進入平津後放手招生，準備接收二萬五千至三萬青年知識分子，加以短期訓練後輸送到南方去。」³¹

一年前，國統區的工人運動和學生抗議已經如火如荼，江南地區的共產黨游擊隊以及城市地下組織也發展迅猛。不過，相較於山東農村革命根據地，那裏的條件仍無法相提並論。在山東，共產黨的軍事進攻勢如破竹。為進一步解放全中國，大批農村革命者被動員起來。就全國情況來看，共產黨幹部依舊主要來源於農村革命根據地，國統區共產黨組織的作用僅僅是第二位的。根據詹姆斯·R·湯森的研究，內戰結束時，共產黨員中農民黨員達到80%，而知識分子佔5%，產業工人則少於1%。³²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信，經過八年抗戰和四年內戰，農村革命者已經接受共產主義理論，經歷過各種政治運動的洗禮，完全勝任城市工作的任務。最後，毛得出結論說：在為新解放區準備幹部時，「大部分應當依靠老的解放區」。³³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準備五萬三千個幹部的決議》，準備接管全中國。按照該決議，華東要完成準備15,000名幹部，並於1949年3月之前配齊。³⁴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華東局決定，15,000名幹部全部從山東抽調。此時，山東分為膠東區（東部沿海）、渤海區（山東北部）和魯中南區（山東中部和南部）三大行政區（參見圖2），以及21個專區、181個縣，專職黨員幹部共計25,000名。其中，一半多將要被派往新區。

按照當時的估計，每個新開闢縣需要75名幹部。五個縣設一地委、專署和軍分區，各需幹部60名。30個縣設一區黨委、行署和軍區，各需幹部80名。120個縣設一中央局，需要幹部300名。這些幹部將處理黨務、軍事、政府、民運、經濟、財政、銀行、貿易、機要、通訊、報紙和教育等事務。華東局由此決定，魯中南區應抽調3,680名幹部去浙江省及其省會杭州，接管省、市、縣三級政權。³⁵

魯中南：革命根據地

如果想知道華東局為什麼會把任務分派給魯中南區，我們就應簡略分析一下這個地區及其革命歷史。魯中南區，1948年底由原魯南區（山東南部）和魯中區（山東中部）合併而成，係內戰期間共產黨控制的山東省三大行政區之一。³⁶這一片土地，頗多矛盾之處。一方面，作為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三位最偉大的儒學家的故鄉，這片地區人口稠密，中國文化傳統深厚。兩千年前孔子在曲阜聚徒講學，開創私人辦學先例。後來，魯中南地區私塾眾多，遍及鄉里。幾百年來，熱愛古典文化、尊師重學成為魯中南最顯著的特徵。另一方面，魯中南又戰火瀰漫。新近出土的一部手稿，即《孫子兵法》說明，中國最偉大的軍事思想最早發祥於此。古代齊國的軍事領導人創造出一套戰爭概念框架，並進一步發展為戰術方法。³⁷自此以後，該地區經歷過的戰爭災難以勝數。到20世紀，作為連接華中、華南四省的門戶，以及兩條重要鐵路幹綫的交匯地，魯中南成為軍閥混戰的溫床。

除各郡國、各軍閥之間的戰爭外，魯中南還有農民造反的傳統。在西部，莽莽群山為一夥夥的土匪們提供藏身之所；在南部，湖沼地帶為農民造反預備庇護之處。³⁸ 11世紀時，魯中南發生一次農民起義。以這則真實故事為原型，明朝作家施耐庵將這一社會問題寫入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貧窮的農民、被通緝的亡命之徒以及屢屢落第的士子被逼上梁山，在沼澤地帶佔山為王。他們羅曼蒂克的傳說，經由說書藝人之心口廣為流傳。在本地百姓眼裏，說書藝人可能比儒家說教更富有感染力。

20世紀時，老百姓中已萌發出幾股半軍事、半宗教的組織，如大刀會、五旗會、三番子等。魯中南人歷來多身材高大，體壯結實，皮膚黝黑。他們擁有鮮明的山東人特質，吃苦耐勞、追求平等、蔑視官府，特別講哥們兒義氣。

魯中南是一片貧瘠的農業區。在多數季節，沂水、沭河非但不能帶來豐沛水源，灌溉農田，反而水患連綿，危害巨大。耕種幾千年來，因為缺乏重大技術革新，土壤侵蝕，地力耗盡，莊稼歉收，年年鬧春荒。

20世紀早期，城市文化擴張全國。隨著近代交通和大眾傳媒，尤其是報紙的發展，新信息、新思想的傳播駛入快車道。到1910年，讀報不但在城市成為流行的消遣方式，而且在農村也湧出一批讀者。魯中南的小學教師們開始讀報、講報，這引起不少學生及其家長的注意。³⁹

1919年，一群城市知識分子發起「打倒孔家店」運動。這為西方激進思潮，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鋪平道路。⁴⁰ 隨著儒學在魯中南日漸式微（一般說來，全國也是如此），地方士紳把他們的孩子送進沿海城市的西式學堂。反過來，這些孩子又從外面的世界帶回來各種信息，並將城市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引進家鄉。

李清灘，魯中南一個地方士紳的孩子，1923年第一個被青島商科職業學校（位於山東東部）錄取。⁴¹ 在學校裏，清灘遇到一些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並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⁴² 寒暑假期間，他把共產黨雜誌

《嚮導》、《晨鐘》帶回家，送給村裏人傳閱。因為在鄉間，什麼事情都是靠口耳相傳的。次年，李清灘的哥哥李清漪在上海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該市工人運動活動家。李家兄弟鼓動同村的年輕人走出家門，接受外部世界的洗禮和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的熏陶。1926年，李清漪因患重病，不得不回家休養。他勸說父親捐款創辦一所平民學校，招收50名學生，散布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理論。他還在本地創辦一份報紙——《農民小報》。在他的帶動下，平民學校和夜校擴展到其他村莊。⁴³

地方士紳的孩子們在到大城市學習近代科學後，往往在其家鄉組織激進的農村革命，反對他們的家庭。這雖然有些諷刺意味，但也並非孤例。在莒縣，出身於地方士紳家庭的趙亮昆，帶頭成立農民協會，強使其父親減租減息。趙亮昆還不顧家庭的反對，「瘋子」般動員老百姓。他說：鬧革命，要先從自己家裏鬧起。1929年9月，因準備暴動泄密，趙亮昆和農民協會的其他四名領導人被捕。當地警察驚奇地發現，這五位共產黨人全都出身於富裕人家。經過他們的家人出錢送禮、疏通關係，趙亮昆等被關押在縣牢房，幸免於難。⁴⁴

就大多數而言，早期共產黨人的革命眼光並非局限在家鄉。相反，他們鼓動鄉村的年輕人離開老家，參加外地的革命運動。只是對魯中南的大多數農民來講，他們很難接受這種做法。因此，與某些南方省份不同，魯中南在1920年代沒有掀起過狂風暴雨般的農民運動。當共產黨人效法南方各省，動員一小部分農民起來暴動時，最終遭到災難性的失敗。

為了培訓農民活動家，毛澤東創辦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這時，魯中南的共產黨組織曾派代表參加。在那裏，毛的預言激勵著他們：「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壓抑不住。」⁴⁵然而，與來自毛澤東家鄉湖南的農民運動領導人不同，魯中南農民協會的第一代共產黨人生於地方士紳之家，在領導本地政治運動時也表現得不那麼靈

活。他們辦夜校，發表演講，教唱革命歌曲，組織遊行隊伍，從教師和學生中發展黨員。這些教師和學生能夠接近農民，充當起教育者、信息提供者、外部世界傳聲筒的角色。只是，在他們的革命宣傳下，運動仍顯孱弱，不足以引發任何實質性的政治變革。

這個問題逐漸引起上級共產黨組織的注意。作為本地共產黨的核心，臨沂師範學校黨支部於1932年發出號召，要求黨員「在農民中交朋友，在農民中發展黨員」。⁴⁶同年冬，沂水縣委設想，黨員可以加入大刀會。他們認為，要壯大共產黨力量，進而發動農民暴動，改造這個一呼百應的農民組織應是最好的辦法。⁴⁷

1932年6月至1933年7月間，魯中南的黨組織幾次暴動，以「建立北方蘇維埃」。不幸的是，對於中共中央已經放棄「冒險的暴動路線」，地方組織者尚不知情。結果，其行動根本得不到外援。據說，早在1931年，中共中央曾發出指示，「地下工作，有武裝必須暴動」。⁴⁸根據以往的精神，他們集合學生、青年農民以及少數大刀會成員，搞起暴動。暴動口號「普羅」透露出，組織者相信：農村暴動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一佔領一個村莊，就宣布建立一個村蘇維埃，然後圍攻附近的縣城。

各縣的暴動很快遭到鎮壓。參加者被殺害，支持者被屠戮，黨組織大多被摧毀。流產的暴動表明，共產主義依然沒有在鄉村扎下根。但是，中共並沒有喪失勇氣，他們確信：自己的努力至少在鄉村「播下了革命火種」。⁴⁹

魯中南：幹部的搖籃

抗日戰爭(1937-1945)提供一個機會，使中共在魯中南得以重整旗鼓。1937年9月，北方局號召：「每一個優秀共產黨員，應該脫下長衫到游擊隊去」。⁵⁰在莒縣，300名學生和年輕農民組成第一支游擊隊。受義和團遺風的影響，該地抗日情緒高昂，游擊隊總有積極的追隨者。不

久，從盜匪和會社群中，小股的地方武裝滾雪球般擴大。各種政治勢力競相角逐軍事領導權。為了立即控制這些隊伍，毛澤東催促魯中南區的黨組織委以八路軍支隊番號，派遣得力幹部加以領導。⁵¹

1939年8月，八路軍主力115師686團開進魯中南，在抱犢崮山區——適宜中共擴張的位置——建立一片游擊區。農民武裝一概被迅速整合進115師。擴軍之餘，中共還開展兩大運動，即「減租減息」、「生產自救」。通過這些運動和民族主義宣傳，無論是游擊隊員、士紳與農民，還是青年、婦女和兒童均被組織起來，結成抗日統一戰綫。經過這一番工夫和努力，中共實力日益壯大，並逐村建立起抗日根據地。⁵²

抗戰期間，農民逐漸構成共產黨軍隊和黨組織的主要來源。雖然大批學生參加游擊隊，但他們不再是農民的教育者或黨組織的天然領導者。與1920年代組織農民的李清灘或其他知識分子不同，這些學生參加農民武裝後，要努力轉變成為其中的一員。當然，在抗日軍隊和組織中，仍有相當數量的知識分子繼續從事教育和文化活動。

對魯中南區小學教育的發展情況，《大眾日報》曾刊發一篇報道。據統計，到1944年中，沂山區的小學數量增長六倍，共計260所，救濟失學兒童12,566名。⁵³所有這些學校均使用魯中南新文字研究會編印的新教材。⁵⁴新教師普遍受到村民和政府領導人的尊重，有人還被授予「教育英雄」的榮譽稱號。⁵⁵此外，各地建立鄉村出版社，組織劇團，宣傳中共政策的集市表演還變成魯中南鄉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少數城市知識分子能有機會在軍隊或政府服務，看起來是幸運的、受尊敬的。很快，他們就嘗到苦果。1938年，魯中南區發起一場反對「托洛茨基主義派分子」（譯者註：簡稱「托派分子」）的政治運動，主要對象就是來自國統區和淪陷區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這場運動肇始於延安。當時，曾在莫斯科受訓的中共領導人（包括王明等28個布爾什維克）受挫，毛澤東關於以農村為重心的戰略變成中國革命的標誌。中共黨內一致認識到，農村根據地比城市更先進、農民比城市知識分子更革命。為此，革命隊伍必須淨化。

魯中南區進行「肅托」運動，主要針對一批具有士紳家庭背景或接受過西方教育的地方黨領導人。30餘名年輕、忠誠的共產黨員，被定為「托匪」相繼處死。⁵⁶由於戰爭的嚴重傷亡和這種有組織的錯殺，從1940年1月至1942年3月，魯南區黨員數量銳減。1940年7月時，該區共有黨員7,300人；到1941年，降為5,719人，較上年減少28%；至1942年3月，為3,308人，較1941年減少42%。⁵⁷

1941年1月，中共山東分局下令停止這種清洗，釋放被關押者，重申中共歡迎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政策。⁵⁸然而，九個月後分局發出的改造魯中南區基層黨組織的指示，再度反映出類似的反知識分子傾向。該指示要求所有黨支部純潔組織，加強黨員的「階級意識」，並強調「（農村黨支部）在領導成份上保持工人、僱農、貧農的絕對優勢」。⁵⁹經過這次變動，在省、區級的中共領導人中，受過良好教育的職業革命者依舊保持著支配地位；在中下層，農民幹部則佔主導地位。

1942年5月，中共山東分局開展「減租減息」運動。魯南區委組織部部長魏思文率領工作隊進行試點。「減租減息」運動的目的在於，不但要給農民以經濟利益，而且要重組農民協會，訓練幹部，以及在農民積極分子中發展新黨員。⁶⁰抗戰結束時，魯中南區中共黨員的數量已經增長到2萬人，其中絕大多數出身於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發現，在從村民中大批發展黨員的同時，自己卻很難入黨。1946年下半年，以「保家保田」為口號，中共在魯南區不費吹灰之力就徵調大約1.6萬名農村青年參軍。⁶¹

儘管土地改革和戰爭動員取得成功，「左」的偏向卻很快蔓延開來。1947年7月，華東局頒布指示，要求對1946–1947年間的土改進行複查。前山東分局書記黎玉被指走「富農路線」，其主要表現是：(1) 土地分配中，較之於貧農，地主分好地、多分地，沒有觸動富農的自耕土地；(2) 幹部、士兵、烈屬和工人家庭多分土地、多得果實；(3) 無地和少地農民即使分得土地果實，也是最差的。⁶²

華東局強調，土改必須經過「一場尖銳的階級鬥爭」。該分局還要求山東所有的黨組織必須重新組織農民協會，重新分配土地。在這份新

文件的指引下，暴力與血腥事件開始上演。某些過激分子甚至製作兩根彩色棍子，紅色的棍子打地主，黑色的棍子打持不同意見的人。在莒縣大店鎮，包括地主及其親屬、同情者在內的120人被打死，其中兩個七歲的孩子被偏激的兒童團殺掉。結果，魯中南有30萬人逃到國統區。⁶³ 1947年6月，國民黨軍隊進攻解放區，暫時佔領魯中南區。此時，地主「還鄉團」瘋狂報復共產黨員及其家屬。這片戰火肆虐的土地經歷一次更加殘暴的殺戮。

在魯中南的歷史上，階級關係演繹下的鄉村土改鬥爭是一幕殘酷的插曲。在1947年土改和地主的報復之前，鄉村中地主與農民之間、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十分緊張。正統的黨史專家常常認為，中國鄉村的特徵就是兩個階級之間的對立。⁶⁴ 然而，有關帝國時期中國鄉村的研究非但並不支持上述觀點，反而表明「鄉村對立顯著地表現為反官府和抗稅。」⁶⁵ 換言之，在這段土改插曲之前，魯中南並不存在尖銳的階級鬥爭紀錄。

抗日戰爭時期地主和農民之間的關係之所以通常是友善的，主要基於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如前所述，第一代共產主義活動家基本上出身於地主家庭，大多數士紳家的孩子也參加抗日戰爭；⁶⁶ 其次，多數地方士紳擁護中共抗日游擊隊；⁶⁷ 再次，地主和農民均能接受中共減租減息的農村政策，村民都被動員起來參加抗日統一戰綫。內戰爆發後，原來支撐鄉村社會妥協的環境發生變化，農民已捲進國共政治鬥爭之中。同樣重要的是，雖然大量共產黨知識分子有著士紳家庭背景，但因為社會風氣敗壞，他們早已名聲掃地。

在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委指導土改之際，運動發生「左」的傾向。中央工委號召「村村點火、戶戶冒煙」，這激勵著地方幹部們。來自延安的指導者只重視生與死的階級鬥爭，而忽視士紳與農民之間源遠流長的合作關係。他們主張對地主毫不留情，很快激起鄉村社會的動蕩。⁶⁸

所謂「左」的偏向終於引起中共中央的密切關注。毛澤東指出，「左」的偏向「主要的是侵犯中農，侵犯民族資產階級」。⁶⁹ 土改中的急進政策

雖被棄置，但它有助於本地農民增強其在革命中的地位，強化其「貧僱農打天下坐天下」的信念。⁷⁰而這種觀念，也決定著農民幹部對待杭州市及杭州市民的基本態度。

共產黨接管前的杭州

杭州市是浙江省省會，位於中國東南部。春秋時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這裏屬越國地界。⁷¹肥沃的土壤、豐沛的降雨、溫暖的氣候對農業生產極為有利。這裏，水稻一年兩熟，盛產茶、棉花以及五花八門的蔬菜。在許多村落，婦女們養蠶刺繡，植桑種橘，增加家庭收入。結果，該地的生活水平遠高於其他大多數省份。11世紀以降，浙江以「魚米之鄉」著稱，人口密度也高於中國其他地區。因為人均土地少，當地農民不得不精耕細作。聰慧的浙江人在學術、政治和商業領域同樣卓有建樹。清代，在省級和國家級政府官員中，浙江人佔有最大比例，達全國的8.2–10.5%。⁷²20世紀，「浙江商幫」在上海商會中佔有支配地位，相當數量的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官員也來自浙江。

幾百年來，與其他大多數省份相比，浙江向帝國政府進獻更多的大米、絲綢、茶葉及其他貢賦。因此，為了保障這一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歷代政府都會維持該省的社會穩定和經濟繁榮。同時，本地民眾也養成犬儒主義性格。他們並不操心皇帝姓甚名誰，只相信自己完糧納稅，便可平安無事。

對自己城市的悠久歷史，杭州人引以為豪。近期的考古發現表明，早在5萬年前，「建德猿人」就在此繁衍生息。新石器時代晚期（大約5,000年前），現在杭州居民的祖先生活在一個名叫良渚的村子裏（位於今天杭州城的北郊）。良渚文化以精緻的陶器和竹器為代表，顯示出這裏是黃河流域之外中國文明的另一個搖籃。⁷³自此以降，良渚文化吸收北方以及海外元素，斷續得以豐富，但依舊保持著自身的特色與個性。